

访谈录

← (上接3版)

体系特点,那主要是指都城建设。如果把《考工记》中讲的那段话做一个抽象的归纳,可以作为都城规划体系的要点,即方正外形、正相交的街道格局(英文称grid)、中轴对称、朝宫居正位。

今天的城市建设不可能再遵循《考工记》的原则,但在一些文化特征上,可以保留传统风格,这也包括社区格局。北京的胡同社区、院落形态都有保留价值。街道景观也可以采用传统要素,如牌楼、灯饰等。

城市还有一个体系,即城市群构成的体系。古代城市那么多,不会是一盘散沙,但是体系的问题又不是凭外观就可以说定的,需要用社会科学的各种判断方法去揭示体系中的机制。外观可以类似,但性质可能完全不同。比如,运河两岸的城市,因为运河具有社会体制特征,其沿岸的城市可以成为体系。但是天然河流两岸的城市就未必,因为天然河流不一定具有社会体制功能。所以,城市体系存在与否是需要论证的。目前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,对于单个城市区域的研究比较成熟,而关于城市群的体系的研究并不理想。几十年前读施坚雅(W. Skinner)的研究,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全国性城市体系,只有区域性城市体系。这是从经济角度说的。我们习惯了从行政角度认识城市,认为存在全国一盘棋的治所城市体系,听他这么一讲,觉得很意外,但马上感到城市体系问题是复杂的。

中国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历史城市,今天城市要现代化,一个麻烦的问题就出来了:怎样做既有现代风貌,又保护好历史遗产?原则性的话好讲,问题都在具体个案上,面对一座具体的古建筑时,是拆还是留,往往有很大争论。所以现在这类问题已经不是空讲原则的事情,而是权力一方的抉择问题。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在这类问题上能对权力方进行制约的机制。所以要看权力方的觉悟。

**文汇报:**人文地理学在国外似乎很火,比如大卫·哈维(David Harvey)的那些研究。国内学者做的人文地理和他们有什么异同?可有能借鉴的地方?您一直强调人文地理学,要重视文化地理环境损失巨大这个问题。能否同时谈谈人类活动与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关系?

**唐晓峰:**很多国家的确比我们更重视人文地理学,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,我们几十年来就不重视人文地理学。1950

年代受苏联影响,是一个方面,但还有些东西不是苏联影响,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一个是总体意识形态,我们强调科学,强调应用(主要是国家建设上的应用),地理学主要是围绕这两个方向发展,具体表现就是只重视自然地理学、经济地理学这两项。另外,我们把地理学限定在理科,容纳经济地理已经不容易了,那些社会问题、文化问题,地理学没有必要管。前一代的地理学家都有这样的认识。现在青年一代地理学家的研究面宽了许多,比老一代人重视人文地理、文化地理,但还是受体制(理科式管理)限制,发展不快。我认为缺少文化地理,就弱化了对中国大地的文化属性的论证与捍卫能力。

在美国,地理学属于社会科学,很明确,所以地理系里有大批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教授,人文地理研究很活跃。大卫·哈维是地理学出身,但他完全不在意学科门类,只要是喜欢的问题,认为是重要的问题,就研究。他这样的人在美国也是极少数,但影响很大,属于学术界的正能量。

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是个复杂问题,几句话说不清楚。这里只想谈一点感受。我在美国念书时,到图书馆找研究城市的书,先到史学类的书架找,怎么不多呢?又到地理类找,也是不多。后来到了社会学书架去看,好家伙,全在这儿!这让我一下子明白城市的一个本质是社会性。那么,我们就需要关注社会学观察问题、研究问题的那套办法,然后结合地理学的空间意识,才能把城市人文空间的问题研究得深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地理学者惠特利(P. Wheatley),研究城市起源很有名,写过《四方之极》(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)这部书。在1980年代,惠特利不仅是地理系的教授,也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研究委员会的主席,他的这个多重的学术职位,反映出他的学术特点,也可以理解他那部名著的特色。研究城市地理问题要有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思考力。

历史地理学的致用,主要还是提供比较宏观的历史经验

**文汇报:**您曾表示,地理学并非一个简单的客观记录,其思想的最高层有一个定向,就是对国土的定性、定向。您认为历史

地理学在国家发展中有什么作用?或者说,对过去的了解和学习,能为今天提供什么借鉴?

**唐晓峰:**地理最朴实的层面是日常地理知识,这是生活需要的,没有大方向的问题。但地理问题一旦提升起来,就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。这主要指人文地理学。既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,当然就会有社会价值观,价值观就是大方向。我国古代的价值观在王朝体制上,地理学的发展也就在这个方向上发展,我称其为“王朝地理学”。到了现在的改革开放的时代,地理学就沿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。“发展是硬道理”,于是发展也是地理学里面的硬道理。这是地理学的一个方面。但地理学还可以有另一个方面,即对理性、人性、和谐世界的追求,这是不能放弃的终极目标。作为学术的地理学,应该有能力用最理想的目标去修正人类一时冲动所干出来的事情。中国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地理学了。

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经世致用问题,不能是简单地到处求用,这样做,并不真的懂经世致用。什么事情可用,以什么方式来用,都要明白。我的体会,历史地理学的致用,主要还是提供比较宏观的历史经验。虽然有些历史经验是没有用的,但地理经验却是另一回事。因为地的稳定性,与地有关系的经验也相对稳定。知道过去的情况,对今天、未来都有参考价值。

举个例子,当年史念海先生做军事历史地理考察,就是受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的委托,很有实战意义。皮定钧将军说:“假定现在就要进行一场战争,我作为司令员,进入阵地,部队部署,粮草运输,作战计划,大致都已就绪,我要再听取一下,以前在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?战争的双方各是由什么地方进军的?又是分别由哪些道路退却的?粮秣是怎样运输的?战地的用水又是怎样取得的?其中获胜者是怎样取得胜利的?而败北者又是怎样招致失败的?”(引自《河山集》四集“自序”)史先生是带着将军的问题来到一处古战场的。所有的问题都具有现实性。

英国的达比教授也讲过欧洲的例子。“在1914—1918年的大战结束之后,所出现的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之一,就是鲍曼(Isaiah Bowman)的《新世界》(The New World)。鲍曼博士现任美国约翰斯·霍布金斯大学(Johns Hopkins University)校长,那时正是美国地理学会的干事。他的书是1924年出版的。名之为‘新世界’,其实却是讲



史念海 (1912—2001), 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



美国地理学家鲍曼(1878—1950)

的旧世界;副题曰‘政治地理’,但你打开书篇一看,其中却充满了早于1800年以前的参考叙述。为什么呢?因为地理学中的新问题,是生根在旧事之中的:波兰走廊、意大利北部边疆、捷克斯拉夫边疆、以及马其顿、西里西亚等问题,都不是1919年的新问题。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参考以往的事实,就可加以讨论的。”(达比1946年2月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)旧的地理是新的地理的基础。我们今天大讲“一带一路”,所用的概念难道不是来自历史吗?

相对来说,技术性的东西,不需要历史,例如引水路线,不需要古人告诉我们,拿现代仪器一测,清清楚楚。历史中的宏观地理大势,这是仪器测不出来的。例如,永定河的引水路线怎样走好,我们不需要古人说(虽然古人做过),现代仪器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。但永定河在历史上糟糕的表现,却是需要历史地理研究告诉我们,引起我们警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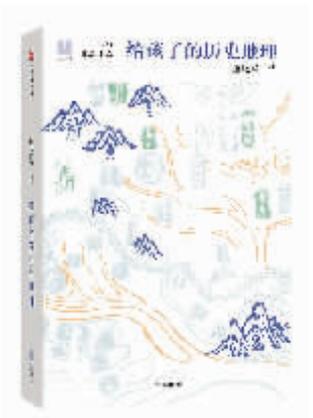
历史地理研究还可以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,在这个方面的例子很多。国内一些省市邀请历史地理学者进入政府参事室工作,主要就是要他们发挥这个方面的作用。在欧洲,历史地理学者有较多的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的不机会,他们在研究与制定历史遗产保护法规上发挥着较大的作用。

**文汇报:**历史和地理知识,基本人人都有,但“具有知识”不代表“明白道理”。在刚面市的《给孩子的历史地理》中,您也提到了“知识”和“道理”的区别,您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有怎样的收获?

**唐晓峰:**中国人,每个人都有一份历史地理标签,那就是祖籍。你可能根本没去过那儿,但你属于那儿。每个人都愿意了解祖籍,这就是历史地理学习。历史地理离每个人并不远。

写《给孩子的历史地理》是一个尝试,在少年儿童读物中还没有这个题目,他们能不能读进去,要看实际情况了。不过,至少,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知识门类,有这样一种启发智慧的方式。地理里面有智慧,这是我最想让他们知道的,所以我反复讲,地理不光是知识,还有道理。道理离不开知识,知识要组合成道理才更有意义。

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,我是外行,但总有一种感觉,那些让孩子看一本扔一本的书,并不是最好的读物。少年儿童应该有一些能够伴随他长久一些的读物,这样的读物会引导出一条知识路径。历史地理应该是一个吸引人的领域,这些知识不仅仅对孩子成长有益,对成年人,也可以在加深阅读中获得更深的对世界、社会、生活的认识。



《给孩子的历史地理》(唐晓峰著,中信出版集团,2018年1月)